

习近平关于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 逻辑理路与擘画路径

潘娜

摘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从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科学原理出发,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最新思想成果,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意涵,推动了中国当代文化建设逻辑和建设形态的第二次跃升。在新的文化建设范式谱系中,一方面,观念形态的文化成长富有时代内涵和思想伟力,以坚定的文化自信守护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上升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要件,另一方面,物质形态的文化基于平衡发展结构和充分发展程度的新需要之下,建构与建设的正义性、先进性表征更为凸显。

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建设 逻辑

作者潘娜,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 100009)。

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创了唯物史观意义上的文化观,但是,他们较少明确使用“文化”这一概念,也没有来得及形成相对独立的文化理论体系。列宁在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对文化观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实践,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文化学说,并产生了深刻历史影响。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承继并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从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科学原理出发,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意涵。

一、新的逻辑起点: 文化成为形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向度

当一个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经济短缺问题不再成为社会主要矛盾时,文化在推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能动作用便会越来越突出。特别是,不同观念文化的政治

性诉求由隐到显、从弱变强,深刻影响着这个国家的政治发展道路和社会生活形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认识到新的时代维度和社会条件下文化的重要作用,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地位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历史使命。

(一) 新高度: 文化上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内涵的重要内容

党的十八大以来,文化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得到提升。2016年7月1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①这一重要论述,创造性地在文化维度上丰富和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厚根基和前进动力,明确了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2017年10月24

日，党的十九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一道写入党章。^②这一历史性的创举，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提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内涵的重要内容，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最本质、最精髓、最高形态上，成为形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向度。

（二）新内涵：强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历史基因

如何对待本国的文明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执政党的成熟度和领导人的实践智慧。习近平指出“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③这个深刻论断不仅表明习近平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总体性逻辑和历史本位立场，而且对思想文化领域存在的“西方中心主义”错误倾向发出了警示。中国改革开放40余年取得了经济腾飞的奇迹，但同时也要看到，信息资本主义借助互联网等传播工具在中国进行“文化殖民”的速度和深度令人震惊。从社会精英到青年一代，从价值观念到生活追求，“文化转基因”无处不在。“颜色革命”的戏码更是在日常生活、人文教育、学术研究等各个场景中上演，无孔不入地侵入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资本主义文化具有强烈的殖民性，如果不珍惜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不守护中华文化的独立性，那么，精神质变便很容易滑向政治倒戈的危险境地，乃至倾覆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基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爆炸”的历史教训和意识形态对决的复杂现实，习近平所作的十九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作出了新的时代阐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

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④这就在总体性维度上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根须扎实于更加深厚的历史文化土壤当中，使之抵抗侵袭、生长壮大的机能更加强健。

（三）新使命：增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韧性

如果说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是形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刚性向度的话，那么，文化则是意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柔性向度并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以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历史的正义性正是在文化的积淀中萃取而出。众所周知，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崛起是建立在海外殖民和资源掠夺的罪恶历史之上，更是壮大于阶级剥削的制度和文化当中；而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史和新中国70年社会主义创业史的缔造，从来都是依靠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家园上艰苦奋斗而来，这种非侵略性的文明形态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具有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包容性与进步性。同时，抵抗外侵的苦难历史锻造了中国人顽强坚韧的民族性格，积淀下不断自我修复、扬弃、创新的文化传统。习近平无比珍视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传统，自信于中国人民的民族性格，坚信以此为血肉生命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然能够更加牢固地承托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在中国的政治实践，使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在21世纪中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二、新的建设范式：从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出发推动中国当代文化建设逻辑和建设形态的第二次跃升

文化范式往往具有较强的惯性，并不总是与时代发展相适应，这就需要强而有力的政治力量推动其创新发展。考察中国当代文化建设范式的历史演展，总体上可以看到文化建设逻辑与建设形态的两次跃升。如果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党的八大的思想路线，

将文化建设范式从“以阶级斗争为纲”中超越出来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⑤从而实现了第一次跃升，那么，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则基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新冷战”国际形势的现实考量，推动中国当代文化建设范式的第二次跃升，即在国内构建符合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文化建设逻辑和建设形态，在国外稳健推进由含蓄到主动的范式转换以应对大国文化霸权挑战。

（一）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根据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推动文化建设范式转型升级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也发生了变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⑥这表明，“人民群众的需要领域和重心上已经超出物质文化的范畴和层次，只讲‘物质文化’已经不能真实全面反映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⑦相应地，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以物质文化建设为优先地位的文化范式，也就不再完全适用于解决现阶段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主要矛盾，甚至有可能由于娱乐性文化产品的过度供给而使文化陷入消费主义窠臼，遮蔽人的真正的精神成长需求。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原理出发，深刻把握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全局中推动文化范式的升级转换，以提高质量和加强社会效益为根本着力点，回应人民群众更高层次、更为全面的文化需求变化，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实现社会主义文化的再建构。

（二）“新冷战”霸权威胁：由含蓄到主动的对外文化范式转换

2018年以来，美国以贸易战为先导，悍然拉开了针对中国的“新冷战”序幕，体现了美国对社会主义新经济体“脱嵌”其主导的西方中心主义世界秩序的深层焦虑。实际

上这种焦虑自苏联解体结束两大阵营对抗之后便一直存在。20世纪90年代初，西方中心主义捍卫者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就将“儒教文明”视为对西方文明最严重的挑战之一。这一方面是来自于西方国家自身经济和人口活力的衰弱，另一方面则是忧虑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强盛之后会清算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开端的屈辱历史，反过来发动侵略和对外扩张。^⑧在这种一贯的霸权逻辑下，美国为了继续保持从两次世界大战中渔利所获得的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世界霸主地位，不遗余力地在中国开展“文化殖民”，以“自由民主”等话术蒙骗、扰乱中国社会秩序，以期将中国同化为任其支配的资本主义追随国家。十八大以来，美国日益发现同化中国越来越不具备可能性，全面遏制中国成为其新的对华战略。只要中国继续发展，美国就绝不会停止基于霸权逻辑的“新冷战”挑战，更不会允许中华文化重焕生机，“干扰”资本主义文化的全球殖民。认清这样的现实，就能够深刻理解习近平强调的“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⑨的重要战略意义。当前，世界格局已然进入以中美软对抗为突出表征的新态势，中国对外文化范式不得不由含蓄转向主动，以使国际社会客观认识中国，理解中国“开放、包容、和平”的文化传统及其支撑下的发展道路。中国从来没有也更加不可能将自身的发展建立在侵略和殖民他国的基础之上，相反，中国“天下合和”的文化特质与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的有机结合，反而超越了资本主义文化的侵略性的基因缺陷，有益于推动21世纪人类文明的历史进化。

三、新的思想引领：确立观念文化发展的主导性原则

观念文化的走向对于国家文化建设而言至关重要。如果错误的观念文化缺乏有效的

引导与规范，那么，党和国家的事业建设便很难凝聚起精神合力。而确立观念文化的主导性原则，关键是要处理好“中、西、马”的关系这一基本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层面上，为正确处理三种思想资源的关系提供了清晰、明确的思想遵循，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中国文化的主体结构、西方文化的互鉴作用获得逻辑确证，并使之有秩序地统合起来形成新的成长动力。

（一）“三个地带”批判论：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习近平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元批判性，将意识形态斗争作为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加以推进并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地带”批判论，从而扭转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抢占我国思想文化阵地的被动局面，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习近平指出“思想舆论领域大致有红色、黑色、灰色‘三个地带’。红色地带是我们的主阵地，一定要守住；黑色地带主要是负面的东西，要敢于亮剑，大大压缩其地盘；灰色地带要大张旗鼓争取，使其转化为红色地带。”^⑩这就在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层面指明了如何在当前复杂多元的意识形态领域开展宣传思想工作。同时，习近平强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根本上是要“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和解决问题”^⑪。也就是说，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抵御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迷惑，更要避免因脱离历史条件、脱离实践而使马克思主义从科学蜕变为意识形态。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历史足以证明，认为社会主义阶段已经解决了所有矛盾是脱离实际的，意识形态斗争必然是一场长期的复杂的斗争。正如拉雷恩所说“意识形态批判不仅在资本主义社会具有必要性，也同样在社会主义社会具有必要性。”^⑫建立在资本主

义经济制度之上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普世价值作为一种虚假意识形态之所以在中国有一定的迷惑性，一方面原因在于某些社会群体特别是部分青年人看不清其本质悖论，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宣传思想战线上的少数工作者被动、含糊、温吞、软弱的工作作风。对于这一点，习近平强调意识形态工作必须保持战斗性，“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主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当有的战斗风格。我们要教育人民认识真理，要动员人民起来为解放自己而斗争，就需要这种战斗的风格。”^⑬

（二）文化自信动力论：凝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文化自信是习近平文化观的思想主脉，其作为“四个自信”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统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实践。习近平深刻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⑭这一论断坚持和运用了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实践性、辩证性、历史性原则，从现阶段中国的现实条件和历史任务出发，指明了主观的精神力量见之于客观的建设行动所能产生的巨大能动作用。习近平在精神动力论的维度上提出文化自信，其落脚点在于精神力量的实践转化，关照的现实主体是劳动实践中的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独特的精神特质、禀赋。2018年3月20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以“四个伟大精神”高度概括了中国人民在实践创造中所形成的这种特质、禀赋，即“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并指出“中国人民的特质、禀赋不仅铸就了绵延几千年发展至今的中华文明，而且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发展进步，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⑮深入考察实践主体的文

化心理结构是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哲学特质。作为影响历史进程的主观方面，实践主体的文化心理结构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精神特质、禀赋的发挥也有高低起落。近现代的屈辱历史，使中国的民族精神遭到重创而陷入自卑的低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中，中国人民才重新找回了对民族历史文化的自信。特别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文化自信无疑客观、准确地反映了中国社会的精神气象。^⑥在这种精神气象之下，中国人民的特质、禀赋的发挥迎来了最好的时代条件。与此同时，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烈愿望，使国家、社会、个人形成了高度的内在一致性，产生了强大的精神凝聚力，这些都化作实际行动投入于轰轰烈烈的新时代建设当中。

（三）交流互鉴新文明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理念

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上提出了交流互鉴的新文明观，强调“只有交流互鉴，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⑦这一思想与西方霸权主义国家所强调的“文明冲突论”形成了鲜明对照。交流互鉴新文明观所秉持的三个最重要的原则和态度是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平等性、包容性，这与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一脉相承。马克思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所产生的那些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吸收和改造了人类思想文化史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这使马克思主义真正赢得了世界历史性价值。《共产党宣言》早已深刻预见：“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此”^⑧。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应该造就不同文明的深刻交融，而非不断挑起世界冲突。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的题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演讲，再次强调了坚持文明交流互鉴的中国理念，倡导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

他指出“不同文明要取长补短、共同进步，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⑨实际上，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一直不遗余力地将包容互鉴新文明观创造性地运用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与实践，践行于坚定不移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努力中。从“一带一路”建设到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召开，中国始终坚持在开放中分享机会和利益、实现互利和共赢。2018年11月5日，习近平在亲自部署、直接推动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人类社会要持续进步，各国就应该坚持要开放不要封闭，要合作不要对抗，要共赢不要独占。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弱肉强食、赢者通吃是一条越走越窄的死胡同，包容普惠、互利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⑩上个世纪，人类已经尝尽了种族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恶果，在21世纪的广阔未来，交流互鉴新文明观必然将越来越广泛地赢得世界人民的深刻共鸣。

四、新的制度环境：建构益于文化更平衡更充分发展的政策导向

文化的繁荣兴盛必然以物质文化的平衡充分发展为基本表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文化建设的顶层设计层面着力解决文化领域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

（一）部署精准扶贫战略：着力解决文化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现阶段，文化建设领域的主要矛盾变化体现为文化需求和文化生产两个方面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即从“物质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从解决“落后的文化生产力”问题到解决文化生产“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问题。这里面的“不平衡”，主要是以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新需要为标准的城乡、区域、群体之间的文化差距，这就需要更具

体地分析实际情况，更细致地提出解决方案。为了有效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习近平创造性地提出了精准扶贫战略思想。文化精准扶贫寓于整体的精准扶贫战略体系之中，并在“治愚”“扶志”“扶智”上发挥独特优势，与其他领域精准扶贫形成联动效应。2015年11月，习近平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扶贫既要富口袋，也要富脑袋。要坚持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理念指导扶贫开发，丰富贫困地区文化活动，加强贫困地区社会建设，提升贫困群众教育、文化、健康水平和综合素质，振奋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精神风貌。”^②这一思想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精神动力论的精髓，没有积极进取的精神意志作为内在驱动，人的实践创造力便无从获得，也就不可能摆脱现实的贫困。所谓美好生活无非就是“积极的生活，如同所有的自然事物，永远都在求新”^③。2017年5月，文化部发布的《“十三五”时期文化扶贫工作实施方案》对精准扶贫战略作出了具体落实，提出“到2020年贫困地区文化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文化发展总体水平接近或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人口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进一步提升，文化的‘扶志’‘扶智’作用充分体现”^④，这就将精神脱贫纳入了与物质脱贫同步实现的轨道。

(二) 倡导文艺发时代先声：让中国精神在社会主义文艺中得到充分舒展

文化发展的“不充分”问题，主要集中在文艺生产的质与量的矛盾上。从量的方面来看，中国多种文化产品的生产能力已经位居世界前列，某些文化产品甚至早已出现产能大量过剩的问题。但是，质的方面却并不尽如人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关于文化建设的系列重要讲话中，不乏对文化艺术产品质量的尖锐批判。2014年10月，习近平在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时，鞭辟入里

地分析了文艺创作的异化现象。^⑤文艺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开放、包容的文化环境不能反而成为滋生消极堕落精神的温床。对此，习近平作出深刻警示——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为了切实提高文化艺术创作的质量和格调，习近平倡导“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激励广大文艺工作者创作出无愧于伟大时代、充分彰显民族精神的文艺作品。2015年10月，中央正式发布了《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提出“让中国精神成为社会主义的灵魂”，指导文艺创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真正起到积极的建构作用，使中国精神在社会主义文艺的载体上得到充分舒展。

(三) 强调社会效益首位原则：统合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正确方向

改革开放尤其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文化产业获得了优先性的政策支持，也得到了人们观念上的认可，一直保持着高歌猛进的发展态势。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实际上已经演变成成为我国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主导供给渠道。然而，市场的消费性、排他性逻辑，却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低收入群体，特别是农村贫困地区人民群众的文化平等权利，即产生了负外部性问题。特别是随着文化产业与资本市场的深度结合，经济效益最大化越来越成为部分龙头文化企业的最高追求，甚至是唯一追求——唯票房、唯收视率、唯发行量、唯点击率问题日益突出，这就在更深层次上损害了广大人民群众获得文化价值的权利，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目标追求产生了内在矛盾。党的十八大以来，为了有效解决这些根本性、方向性问题，习近平将文化建设的社会效益首位原则放在全面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层面予以强调，指出“关于文化体制改革，我只强调一点，就是要在继续大胆推进改革、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

化产业快速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同时,把握好意识形态属性和产业属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⑤为了形成示范引领效应,中央着重对国有文化企业作出了改革部署。2015年9月,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将国有文化企业履行社会效益首位原则落实到企业章程和评价考核体系当中。在提质增效的同时,国有文化企业还进一步成为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新增量,这与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的思路相向对接,成为促进新时代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协同合力发展的新的实践路径。

总之,习近平关于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使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在21世纪中国获得了新的理论生命力,其实践优先性的哲学品格不断推动思想能量的现实转化,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强而有力的行动指引。

注释:

①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2页。

②⑥⑨⑭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04、9、33-35、33页。

③ 习近平 《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6页。

④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1页。

⑤ 俞吾金 《邓小平与中国当代文化范式的转变》,《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

⑦ 中共中央宣传部编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学习出版社2018年版,第69页。

⑧ [美]塞缪尔·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09年版,第205页。

⑩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28页。

⑪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54页。

⑫ [英]乔治·拉雷恩著,张秀琴译 《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54页。

⑬⑳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219、50页。

⑮ 习近平 《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3月21日。

⑯ 孟宪平 《马克思主义文化动力思想及其实践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34页。

⑰ 习近平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人民日报》2014年3月28日。

⑱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4页。

⑲ 习近平 《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17年1月20日。

⑳ 习近平 《共建创新包容的开放型世界经济》,《人民日报》2018年11月6日。

㉑ [美]大卫·哈维著,许瑞宋译 《资本主义的17个矛盾》,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238页。

㉒ 《文化部发布〈“十三五”时期文化扶贫工作实施方案〉》,《中国文化报》2017年6月8日。

㉓ 习近平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9页。

㉔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85页。

[责任编辑:郭强]